

北京将在数字货币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

北京商报讯(记者 岳品瑜 刘四红)落地预期不断升温下,数字货币成为市场热议的一大话题。9月6日,在2020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殷勇表示,要切实服务好本届服贸会和金融板块各项工作成果的落地和应用,深化金融科技的改革创新,发挥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和金融管理中心的“双优势”,突出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监管科技等重点,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科技创新中心,将深入开展金融科技监管沙箱试点,利用冬奥会等场景,在数字货币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力争取得引领性的突破。

对于未来数字货币如何使用的问题,香港金融管理局主席李伟仁谈到,数字货币不需要绑定任何银行账户,从而摆脱了传统银行账户体系上的限制;另一个吸引人的“奥妙之术”是数字货币能够进行双离线支付,交易双方的手机即使都处于离线断网的状态,只要两个装有数字货币数字钱包的手机碰一碰,就能实现转账和支付功能。

而仅在前一日,通州区区长赵磊亦曾在2020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谈及数字货币。他指出,今年4月,北京市金融服务工作领导小组以一号文件印发《关于在城市副中心打造国际财富管理中心的行动方案》,明确赋予副中心“全球财富聚集地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财富管理中心”的定位,并将在副中心试点新型金融牌照、法定数字货币、资管产品个税递延等27项财富管理前沿领域的改革任务,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支持副中心发展财富管理产业的战略决心。

事实上,今年以来,央行数字货币研发进度大大加快,早在8月,数字货币就已成为官方提及的高频词。如8月14日,商务部印发《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并明确将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及中西部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

深圳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数字货币研究与移动支付创新应用等金融科技取得积极进展。

8月14日 商务部: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及中西部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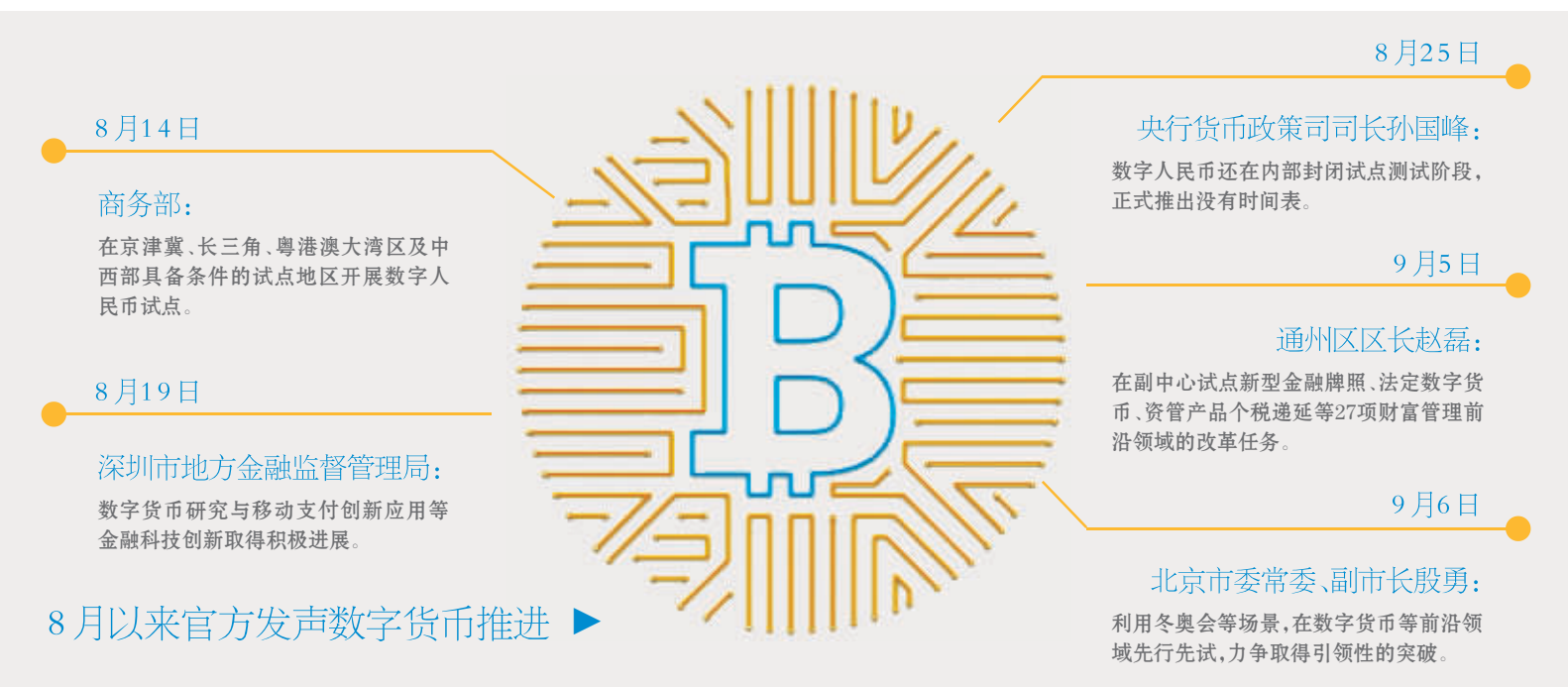
8月19日 深圳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数字货币研究与移动支付创新应用等金融科技取得积极进展。

8月25日 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数字人民币还在内部封闭试点测试阶段,正式推出没有时间表。

9月5日 通州区区长赵磊:在副中心试点新型金融牌照、法定数字货币、资管产品个税递延等27项财富管理前沿领域的改革任务。

9月6日 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殷勇:利用冬奥会等场景,在数字货币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力争取得引领性的突破。

8月以来官方发声数字货币推进



点。在责任分工上,央行制定政策保障措施,先由深圳、成都、苏州、雄安新区等地及未来冬奥会场景相关部门协助推进,后续视情况扩大到其他地区。

而,深圳方面表示目前数字货币研究与移动支付创新应用等金融科技取得积极进展。此外,海南监管方也强调将积极争取法定数字货币试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贸易、跨境投融资和穿透式监管中的应用。

数字货币试点四面开花,这一点从市场应用不断测试中也可窥出。最近一次引发关注的是建设银行数字人民币钱包的短暂露面,该App增加了“数字钱包充值”以及“数字钱包”两个子菜单,用户可以绑定银行卡直接开通。

而这并非孤例。除建设银行外,据了解,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还已与滴滴等机构达成战略合作,并与B站、美团等机构进行接洽,在分

析人士看来,这意味着数研所正通过商户为数字货币向C端服务铺路,试点动作有望加速。引发关注的是,多地试点研发步履不断,数字货币距离大规模落地还有多远的距离?

针对数字货币的推出,央行透露的进展是:目前,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遵循稳步、安全、可控、创新、实用原则,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以检验理论可靠性、系统稳定性、功能可用性、流程便捷性、场景适用性和风险可控性。但目前的试点测试,只是研发过程中的常规性工作,并不意味着数字人民币正式落地发行。此外,针对何时正式推出,央行曾多次强调尚未有时间表。

在业内人士看来,数字货币距离实际推出应该还有全面测试、试运行和正式运行三个阶段。考虑到数字货币是下一代人民币的全面数字化,影响程度深远,因此央行应该谨慎推出。根据整个进度来看,目前试点的发展进度是符合预期的,未来应该会从四个地区的落地测试到多个重点城市多领域的测试应用。

总体来说,尽管已大规模内测,但距离数字货币的推出还有一定距离,且对现有货币体系的框架及运行应该不会起到实质性影响。尽管数字货币的推出仍没有时间表,但试点动作仍有望加速,并看好中国央行数字货币对电子支付产业链的带动。

应战净值化转型 理财子公司加速揽才

银保监会官网日前披露关于招银理财7人任职资格的批复,这也是半年度大赚15亿元后,招银理财“首席”班底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9月6日,北京商报记者根据银保监会披露的信息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有11家银行理财子公司的52位相关高管、部门负责人的任职资格获核准。与此同时,理财子公司的“招兵”工作也未停止。伴随着团队搭建工作有序进行,理财子公司产品发行规模在不断壮大,业内人士指出,净值化转型将会催生越来越多的混合类、权益类理财产品。

招银理财“首席”批量到岗

根据银保监会官网信息显示,银保监会核准招银理财首席固收投资官陈萍、首席项目投融资官魏广文、首席权益投资官范华、首席风险官方凌、研究总监吴松凯、首席信息官荀宏、资金财务部总经理张亚娟的任职资格。

在招银理财本次批量就位的管理人才中,不乏有从市场引入的“外脑”。比如招银理财首席权益投资官范华在去年9月加入招商银行前,先后在高盛公司工作11年、中投公司工作10年,从事资产配置和多资产绝对收益的投资,曾任中投公司资产配置部、债券与绝对收益部总监,高盛全球风险模型部主管。

此前,2019年8月,彼时正在筹建中的招银理财曾对外公开招聘多名领军人才,包括首席权益投资官、固定收益首席投资官、量化衍生品首席投资官、首席风险官、首席信息官。另外,同时也在市场板块、投研板块、风控板块、IT及运营板块招聘资深专业人才。

“招银理财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发展除了固收以外的产品,并组建了权益投资团队。招银理财未来发展方向是希望成为一个全能型资产管理公司。”范华表示。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招银理财管理的理财产品余额2.38万亿元,较去年末增长8.68%。新产品余额1.09万亿元,较去年末增长59.08%,占理财产品余额(不含结构性存款)的45.8%,较去年末提高14.58个百分点。

52位理财子高管相继就位

自银行理财子公司筹备之初,人才团队搭建工作一直备受市场关注,相关管理人才的就位更是业内瞩目的焦点。9月6日,北京商报记者据银保监会披露的数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有11家银行理财子公司52位相关高管、部门负责人的任职资格获核准。涉及的公司包括交银理财、中银理财、杭银理财、农银理财、信银理财等,涉及职位包括董事长、总裁、副总裁、首席财务官等。

作为资管“新兵”,理财子公司的揽才工作从未停止。北京商报记者翻看招聘网站近期信息发现,从研究助理至副总裁,理财子公司发力净值化转型过程中,人才争夺战正不断升级。

在对领军人才的招聘中,具备大行资管团队或基金公司管理经验者更为“吃香”,透过招聘信息亦可看出银行对于权益类人才的渴求。

例如9月2日,某招聘网站挂出的一则招聘信息显示,某银行理财子公司正在公开招聘副总裁,岗位职责包括管理项目行业调研、理财产品设计、项目投资、权益投资、组合配置等条线管理工作;组织风险控制,政策信息研究,统筹单位投研工作。招聘要求该人员具备十年以上工作经验,且具有公司副总级别岗位任职经验;人才需求来源于银行(大行)资管团队副总、总助或是基金公司副总。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银行理财子公司广撒“英雄帖”开展“抢人大战”,但也面临着招人难等挑战。理财子公司人才缺口

大,短期内较难招聘到足够的人员,此外,一线城市聚集大量资管专业化人才,若理财子公司注册于其他区域,异地人才引入相对困难。”普益标准研究员赵璐如是说。

金融监管研究院副院长周毅钦指出,当前理财子公司对于权益的研究和人才体系架构仍然非常薄弱。个人认为理财子公司相对比较完整的体系搭建至少要2-3年。

净值化转型下发力权益投资

伴随着团队搭建工作有序进行,理财子公司产品发行规模不断壮大,净值化转型也在稳步推进。

目前,已有14家银行理财子公司正式开业,从产品发行情况来看,北京商报记者根据中国理财网数据梳理发现,截至2020年9月6日,银行理财子公司在过去一年多来登记的理财产品共计1846只。以风险等级划分,理财子公司发行中低、中风险产品数量最多,具体来看,一级(低)、二级(中低)、三级(中)、四级(中高)风险的产品分别有19只、688只、1135只、4只。

就投资性质来看,当前理财子公司主要发行的产品包括固定收益类、权益类、混合类三种类型。目前来看,固定收益类产品占据绝大多数,该类型共发行了1411只产品。混合类产品也逐渐增多,达到432只,权益类产品仅有3只发行。

业内人士指出,资管新规使整个资管行业都在转型净值化,而净值化转型将会催生越来越多的混合类、权益类理财产品,在这样的前提下,理财子公司纷纷加大了对权益类投资布局的探索。某股份行理财子公司人士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目前已有发行的产品权益占比在20%-40%区间。对于权益类产品在下半年可能会有所布局。

光大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王一峰指出,理财子公司开业初期往往以固定收益类为首发产品,逐渐推出混合类及权益类品种,随着更多理财子公司相继开业或产品发行进入常态化,理财子公司混合类及权益类占比或进一步提升。

“2020年以来,随着已有理财子公司运行更为成熟,新设理财子公司相继发行产品、产品平移工作的持续推进,理财子公司产品的整体规模或增至2万亿-3万亿元。”王一峰如是说。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震 马驹

不良率过高 农村金融机构风险隐现

农村金融机构已经成为支持“三农”、县域客户的重要金融力量,但这类金融机构普遍规模较小、防风险能力弱,管理体制尚不完善,这也为农村金融机构稳健发展带来挑战。据北京商报记者9月6日不完全统计,多省已发布2019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在多份报告中指出,农村金融机构风险问题尤为突出,其中,不良率超5%、管理粗放等问题屡被提及。

粗放经营司空见惯

农村金融机构的运营情况已经成为多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的专项审计重点。北京商报记者查询各省2019年度审计工作报告发现,部分农村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不完善、延缓风险暴露、信贷管理不尽职、虚报贷款数据等问题在年度审计调查过程中得到暴露。

吉林省、湖南省、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审计工作报告均指出部分农村金融机构存在至少不良贷款或不良贷款率过高的问题。例如湖南省在审查中发现,辖内2家农商行进行改制时不良贷款处置不合规,不良贷款率不真实;5家农商行不良贷款率超过5%的监管红线;6家农商行将5.02亿元不良贷款违规转为正常贷款。

部分农村金融机构则存在内控制度不健全、违规放贷等问题。例如,河北省在审查中发现,该省农村信用联社未认真履行“一岗双责”,经营管理粗放,特大案件时有发生,问责处理不到位,系统风险管控意识及能力亟待加强。

一位分析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其通过研究中小银行大量骗贷案件、违法发放贷款案件和监管处罚案件,发现中小银行粗放经营问题司空见惯,不容忽视。他指出,由于绝大多数中小银行脱胎于城市、农村信用社,先天的重要财务指标不尽如人意,加上没有经历过几大国行剥离不良资产经历,风险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刘澄也表示,部分中小银行,尤其是部分中西部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坏账比例较高。

疫情加速风险暴露

银保监会副主席祝树民在今年8月发表的文章中披露,目前全国已组建农村商业银行1545家,农村合作银行27家,现存农村信用社694家。然而受新冠疫情影响,银行收益下滑,中小银行风险集中暴露。

对此,看懂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程宇指出,疫情只是加速了中小银行风险暴露的过程,而非其问题根源。他表示,农村金融机构的问题根源主要在于“前期监管缺位,公司治理混乱,股权结构混乱,与地方政府关系不清”等体制机

制问题。监管部门也曾多次指出,要从根源上推进中小银行改革,必须强化中小银行股权管理,健全符合中小银行特点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内控体系。

祝树民在今年8月发表的《以深化改革推动农村中小银行公司治理建设》中指出,农村中小银行普遍存在“内部人控制问题”,由于广大中小股东数量众多、持股分散、话语权微弱,不愿或不会参与治理,机构经营管理易形成被高管和少数关键人控制的局面。此外,“外部人控制”问题也一定程度存在。他表示,少数股东入股动机不纯、利益诉求不当,通过股权代持、抽屉协议或者隐瞒关联关系等不当手段控制机构,直接操纵经营,个别股东甚至违规大肆套取银行资金,把银行变成自己的“提款机”。

合并重组抱团取暖

在合规经营叠加盈利下滑的双重压力下,不少农村金融机构开始走上合并重组、抱团取暖之路。7月30日,由铜山农商行、淮海农商行、彭城农商行3家合并而成的徐州农商行正式挂牌成立。就在前一日,陕西银保监局公布,陕西榆林榆阳农商行、横山农商行以新设合并的方式发起设立陕西榆林农商行获批。一位接近监管的人士曾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竞争力不强的中小银行走向合并将成为常态。

程宇表示,农商行合并重组的首要目的是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这种方式将成为改革的主流,但在宏观经济下行的环境进行重组的劣势也不可忽视,银行资产质量不可避免出现劣变,成本必然高于宏观经济形势良好时。

刘澄则认为,目前监管部门对中小银行改革的整体定位仍然是推动其走向市场化,合并重组或者兼并没有成为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一方面由于国有大行的金融服务在不断下沉,而部分农商行、农信社资产质量不佳,缺少兼并价值;另一方面则是随着银行数字化趋势日益明显,农商行、农信社,甚至城商行在经营体系中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比如以前农民在家门口的银行网点办理贷款,现在可以在家里通过支付宝或其他网络渠道就把钱借了”。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震 实习记者 杜晓彤